

SW 百花散文书系·古代部分

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宗 濂





百花散文书系·古代部分

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

宋

濂散文选集

高志忠 高天 选注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宋濂散文选集/高志忠, 高天选注.—3 版.—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6

(百花散文书系.古代部分)

ISBN 978—7—5306—5400—2

I. 宋... II. ①高...②高... III.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明代 IV. I 26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630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125 插页 2 字数 215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3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9.00 元

编辑例言

一、中国古代散文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它和诗歌一样,同是中国古代文学最主要、最有特色的文体形式,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璀璨宏丽的文化宝库。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继承古代散文优良传统,以促进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和提高,并供广大读者借鉴欣赏,特编辑这套“中国古代散文丛书”,作为“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版。

二、散文文体范围,代有嬗变,古今不同。本丛书所选,以抒情、记述体等文学性较强的散文为主。入选作家上起自先秦,下迄于清代。按不同作家分别成册。各书篇目排次,原则上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以便读者了解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演变轨迹。

三、本丛书每书分两部分:一为论文,内容除简介作者生平、文学活动外,着重结合选入本书的作品,分析、评述其散文创作思想特别是艺术特色、散文创作发展历程及影响。一为散文,每篇均附加题解、注释。

四、论文部分力图与散文部分互补共济,以论文帮助

读者对所选散文提高到理性认识,又以所选散文来深化读者对论文的感性认识,两相印证,使本丛书除选注散文佳作供阅读之外,在一定程度上还兼具作家论乃至古代散文史的作用,既不同于一般散文选本,也有异于一般的古代散文史而自具独有的特色。

五、每书所选散文,除了作者有代表性的名篇佳作外,还照顾到作者不同时期、不同题材、风格的文学性散文,以便体现作者散文创作发展道路。

六、题解除解释文题中有关词语、专门名词等和说明写作时间、出处、版本等外,还对作品写作背景、思想价值、艺术特色以至艺术手法等,加以简明的评述。

七、注释以疏解难字、难词以及典故、职官、器物、人名、地名等为主。对其重要者、用法特殊者,并援引出处或例句,以便读者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

百花文艺出版社

宋濂和他的散文

高志忠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其先家金华(今属浙江)潜溪,故以为号焉。至宋濂,始迁浦江(今属浙江)青萝山,因为浦江人。《明史·宋濂传》说他:“幼英敏强记。”他的同门好友郑涛于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八月为他所作的《小传》记载:

年六岁,入小学,其师包文叔,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尽,自后,日记二千餘言。……九岁颇学为诗,有道士楼节翁至,或命赋诗为赠,景濂操笔辄成四韵,有“步罡随踢脚头斗,嚙水能轰掌上雷”之句,

众因目为神童。……景濂家素贫，力不能致明师儒，而乡中授徒者皆畏景濂，又莫敢为之师，自是，或作或辍者十年。及乡先达张教授继之自浏阳满官归，闻景濂善记也，亟延见于别墅。问：“《四书》正传若干日可通背？”景濂以一月为答。继之不之信，抽架上杂书，俾记五百餘言。景濂以指爪逐行按之，按毕成诵，一字不遗。继之惊曰：“有才如此，不可废也！城南闻公梦吉，乡贡进士也，吾引汝就学焉。”景濂辄担簠徒步从之。闻公深喜，授《春秋》三传之学。

关于他的“英敏强记”，其门人郑楷于洪武十四年（1381）十二月所作的《潜溪先生宋公行状》也有类似的记载。宋濂自己也曾回忆过他的青少年时代的读书求学生活。《送东阳马生序》说：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

元代著名学者吴莱，讲学于浦江白麟溪上义门郑氏的东明书院，宋濂和同里的胡仲申（翰）俱从吴莱学古文辞，取经史及诸子百家，昼夜研究之，悉得蕴奥。又登柳贯、黄潛之门，为私淑弟子。柳、黄为当世大儒，天下师仰，然皆礼宋濂如朋友，每有咨问，则终日言之而无稍倦之色，往来无日无之。宋濂为文，多经二公指授。吴莱解

馆而归，“宋濂嗣主教习”，于东明山讲经授徒，时宋濂二十五岁。郑楷《潜溪先生宋公行状》说：“讲道东明山中，受业者一门凡四十余人。始终越二十年……先生年甫四十又五。”郑氏九世同居，颇有义风，宋濂愿卜而为邻，遂于至正十年（1350），自金华迁浦江青萝山，时宋濂三十岁。“入青萝山中不下书屋若干年，得郑氏所畜书数万卷。书无不尽阅，阅无不尽记。”（杨维桢《潜溪集序》）“至正己丑，用大臣荐，擢先生将仕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潜溪先生宋公行状》），以亲老固辞不就。后因世乱，乃与其弟子郑渊于至正十六年（1356）入小龙门山著书。其被荐为翰林国史院编修的时间，多数史料皆曰“元至正中”，而《潜溪先生宋公行状》记年具体，为至正己丑，即至正九年（1349），时宋濂三十九岁。其于小龙门山所著书曰《龙门子凝道记》，成书于至正十七年（1357）正月，四月编为上中下三卷。

朱元璋取婺州（1359），召见宋濂，授宁越府（由婺州改）郡学五经师，明年“庚子（1360），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樊观奉书币造门征先生”，“七月，以先生为江南等处儒学提举，十月，奉旨入内授皇太子经”；“甲辰（1364）十月，改起居注”（《潜溪先生宋公行状》）。“洪武二年（1369）诏修元史，命充总裁官。是年八月史成，除翰林院学士。明年二月，儒士欧阳佑等采故元元统以后事迹还朝，仍命濂等续修，六越月再成”。“是月以失朝参降编修。四年，迁国子司业。坐考祀孔子礼不以时奏，谪安远知县。旋召为礼部主事，明年，迁赞善大夫”。“六年七月，迁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赞善大夫”。“九



年,进学士承旨,知制诰,兼赞善如故。其明年,致仕”。“十三年,长孙慎坐胡惟庸党,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今四川省茂县)。“其明年,卒于夔州(今四川奉节)”;“正德中,追谥文宪”(《明史·宋濂传》)。

宋濂于学无所不通,有明一代礼乐制度,其所裁定者居多,为开国文臣之首。他的著作在正德年间被编为《宋学士全集》,嘉靖年间又两次增补,但仍有遗稿未收。清代嘉庆年间,严荣编刻《宋文宪公全集》五十三卷,收诗文一千二百六十三题,还收了《龙门子凝道记》、《浦阳人物记》,是宋濂文集的最全的版本。近年,浙江大学历史系龚剑锋等学者又在浙江搜集到宋濂遗文遗诗三十五篇,刊载于1993年《文献》。此外还有《篇海类编》二十卷、《洪武正韵》十六卷,主编《元史》二百一十卷。

二

宋濂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历程的轨迹,有一种非常有趣的矛盾现象:他尊奉道统,有志继承东莱吕祖谦的绝学,又师从吴莱、柳贯、黄潘诸人,但他却没有以理学家名世;他渴慕古代隐逸,向往啸傲林泉,但他始终没有成为一个隐者。他的文学成就和影响也是如此,虽为开国文臣之首,一些作品开了“台阁体”的风气之先,但没有像比他略后的“三杨”那样形成流派(“三杨”指永乐、弘治前后明代诗坛上出现的“台阁体”的代表人物杨士奇、杨荣和杨溥,他们都先后官至大学士,故称他们的诗派为“台阁体”)。究其原因,盖由于他的学识、他的思想和他所处

的时代使然。

宋代兴起理学：“南渡后新安朱文公、东莱吕成公并时而作，皆以斯道为己任。”宋濂思继吕氏之绝学，然终于没有成为理学名家，他在《龙门子凝道记·题记辞》中说：“濂学道三十年，世不我知，不能见其一割之用。……德泽弗加于时，欲垂空言以诏来世，古志士之深悲也。”他之所以没有成为吕氏的继承人，不在于他的主观愿望，而在于他的学问根基。刘基序他的诗文时说：“上究六经之源，下究子史之奥，以至释老之书，莫不升其堂而入其室。其为文则主圣经而奴百氏，……时取老佛语以资嬉戏。”（刘基序宋濂诗文的这段话引自《宋文宪公全集》卷首一，本文所引原文，除特别注明者外，皆引自此书）。这就不是“六经注我”，而是“我注六经”，并且是以子史百氏杂老、佛而注六经。这有点类似韩愈的“载道”，而与宋代的理学南其辕北其辙了。他的《龙门子凝道记》二十四篇、四符、八枢、十二微、言合、言奥、言蕴、大旨不过寓言，不类朱亦不类吕，不类陆亦不类王，乃其自发机杼之作。他所说的“道”，并不是“天理”，而是对孔孟之道的还原，在宋代和明代的“理学”之间，即介于“理学”与“心学”之间的一种流向。

宋濂生当元季，因天下骚乱而有肥遯山林之思，他的许多文章，如《见山楼记》、《庐龙清隐记》、《北水山居记》、《竹溪逸民传》、《抱瓮子传》、《空同外史传》、《兰隐亭记》、《王冕传》、《看松庵记》等等，或描绘隐士生活的超绝尘世的幽雅，或歌颂隐者品格的脱尽凡俗的高尚，但他总是把“隐”看作是逃避乱世的手段，而不是把“隐”看

作是对理想境界的追求。他认为“出处之正”是邦无道则隐，邦有道则出。当推荐其为翰林编修时，虽然“以布衣入史馆为太史，儒者之特选”，可在元末大乱将起之时，是“邦无道”，他则不“出”，而以亲老为理由“固辞不就”。当朱元璋定鼎金陵时，他则说：“昔闻大乱极而真人生，今诚其时矣。”是“邦有道”，他则不“处”，虽然亲更老而却“幡然应诏”（《潜溪先生宋公行状》）。宋濂的“隐”，既不同于陶渊明的“复得反自然”，也不同于王摩诘的“王孙自可留”，而颇似诸葛亮的“躬耕南阳”。所以他既不“种豆南山”，也不修建别业，而是以舌耘，以笔耕，坐馆授徒，讲道著书，欲有用当时而施及后世。他的“隐”，只是“心隐”，仅仅是“欲骖鸾翥凤，招握佺、韩终，翩然被发而下大荒”（《见山楼记》），仅仅是心里想想而已。他的“隐”，只是“馀隐”，是“稍有馀暇，或支颐看云，或被发行松间，遇得意时，辄击缶浩歌，声振林木，翛翛然如尘外人”（郑涛《小传》），偶或为之而已。

宋濂的《拙庵记》，是研究宋濂思想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篇文章。文中说：

周公既亡，本摧末弊，秦刻汉驳，而世以不治。吾握其要而举之，爬痒择纇，取巨捐细，德修政举，礼成乐备，广厦细旃，每资之以献替。吾于斯艺，虽管仲复生，犹将扼其吭而鞭其背，是不谓之巧不可也。

在这里，宋濂是以孔孟之道的继承人而自居的。他甚至超过了诸葛亮的“自比管仲、乐毅”，而要扼复生的管夷吾之吭而鞭其背也。这不是大言，而是述志。我们从中可

以清楚地看到宋濂不是一个清高出世的隐者，而是一个积极用世的贤才，只是由于他生逢乱世，在伺机择主而事，待价而沽罢了。

宋濂自少以文雄一时，元代的欧阳元序《潜溪集》说：“其气韵沉雄如淮阴出师，百战百胜，志不少慑；其神思飘逸如列子御风，翩然寡举，不沾尘土；其辞调尔雅如殷卣周彝，龙纹漫灭，古意独存；其态度多变如晴霁终南，众皱前陈，应接不暇，非才具众长、识迈千古，安能与于斯？”他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外国贡使亦知其名，……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明史·宋濂传》）。然而，宋濂并没有如“台阁体”那样影响文坛几达百年之久，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究其原因，大端有二：其一是政治的原因。即其晚年待罪茂州，客死夔门，其文未能尽早地大量刊布。正德九年（1514），张缙刊刻宋濂文集时不胜感慨地说：“其集久且渐湮，虽有《潜溪》前后集、《文粹》出于郑氏所辑，及蜀本、衢本、外国本皆略而未定。……呜呼！韩文冠唐室、法百世，而逾二百年，欧阳子始得之汉东弊筐，遂流无穷，如挂星汉。公集亦越百载而今且复广，予不敢拟欧阳子，而公固吾明之韩也。”其二是内在的原因。即他的文学主张同于唐宋古文运动的韩愈、欧阳修，与明初的社会风尚颇不合拍。唐、宋、明三朝之初，文坛形势类似，唐初有“上官体”、宋初有“西昆体”、明初有“台阁体”。他们都注重形式，注重词藻，歌颂升平，粉饰现实。但是，他们既符合当时人们经过多年战乱或异族入主后而重新实现大一统的安于和平的安定心理，又符合最高统治者的愿望，

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都曾执文坛牛耳于一时。而在新王朝的弊端逐渐暴露、社会矛盾逐渐尖锐之后，这种文学仍继续粉饰现实时，便会被人们所厌弃，才有人起而反对这种文学流派。如唐先有陈子昂，而后有韩、柳诸人；宋先有王禹偁、柳开，而后有欧、苏诸人。明代的宋濂主张“明道之谓文，立教之谓文，可以辅俗化民之谓文”（《文说赠王生黼》）。同韩愈、欧阳修一样，以“载道”为本，反对“新奇”，反对“陈腐”。他说：“世之论文者有二：曰载道，曰纪事。纪事之文，当本之司马迁、班固；而载道之文，舍六籍吾将焉从？虽然，六籍者本与根也，迁、固者枝与叶也。……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骋新奇者，钩摘隐伏，变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读，且曰不诘屈聱牙非古文也。乐陈腐者，一假场屋委靡之文，纷揉庞杂，略不见端序，且曰不浅易轻顺非古文也。”（《文原》）他的这种主张不合明初的时尚，自然形不成流派而主宰文坛了。而宋濂之生也早，反对“三杨”的任务只好由“前后七子”去完成了。

然而宋濂的文学成就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还是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总结的。

三

宋濂散文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他的传记文、游记文和寓言文之中。他的创作道路，可以他应朱元璋之诏作为划分前后两期的界限。前期的作品，多以反映逃避世乱、

歌颂隐居为基调；而后期的作品，则多以积极进取为基调。但是，后期的某些作品，歌颂升平的倾向也是比较明显的。

宋濂年轻时，曾师从闻人梦吉，学习《春秋》三传。他对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特别推崇。元至正九年（1349），三十九岁的宋濂以布衣被荐为翰林国史馆，但他以亲老而固辞未就，而明朝刚刚建立后的洪武二年（1369），五十九岁的宋濂还是担任了修《元史》的总裁官，他的史才是为两朝所公认的。因为《元史》一是出于众人之手，二是成书时间紧迫，前后两次开局，总共只用了十一个月，常常为人诟病，故而不能作为宋濂史传文的代表。代表宋濂史传文的成就者，当是他的《浦阳人物记》、《杂传九首》和他入明前撰写的一些人物传记。这些传记，或记先达，或传循吏，或写隐逸，或述平民，不仅弥补了正史之缺，而且艺术价值也颇高。他的这些人物传记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就，乃在于他能根据所传人物的特点，集中笔力，侧重某一点，或传之以事，或传之以德，或传之以情，或传之以奇，不枝不蔓，不平不板，一斑以见豹，一滴而知咸，遂使笔底诸色人物皆栩栩然而如生。

其以事传者如《杨璇传》、《胡长孺传》、《叶治中历官记》、《宣尉曾侯嘉政记》、《元故楼主簿行状》等等。《杨璇传》载于《浦阳人物记·政事篇》。宋濂对政事特别看重，他说：“政事于人大矣，操厚伦惇俗之具，执舒阳惨阴之柄，御赏善罚恶之权，任出生入死之寄。其在朝廷，则四海被其泽；其在一郡，则一郡仰其赐；其在一县，则一县仰其福。苟得其人，则上明下淳，歌谣太平；一或反是，则

流毒四境，神怒民怨，至有激成他变者。其所系甚重且难也。”所以他说：“能以一善自效于官者，岂可使之泯泯无闻乎！”（《浦阳人物记·政事》）他传杨璇就写了“顺风鼓灰，以火烧布，（布）燃马惊，奔突贼阵”、“噬臂出血、书衣为章，具陈破贼形势”以辩诬这两件事，就把杨璇的有谋有勇有智，且正义凛然不可侵，表现得淋漓尽致。《宣慰曾侯嘉政记》也仅仅以曾华驻军浦阳一月而秋毫无犯一事为主，且与大将赵野相比较来记叙，就把一个善驭士卒、柳营整肃、深受民众拥戴的将领的形象勾画无遗了。《胡长孺传》亦然，也是以典型事例来凸现人物的品格。胡长孺任宁海县主簿时智斗脱欢察就是极好的实例：

岁丁未，浙江大侵。戊申，复无麦，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脱欢察议行赈荒之令，敛富人钱一百五十万给之。至县，以餘钱二十五万属长孺藏去，乃行旁州。长孺察其有干没意，悉散于民。阅月再至，索其钱，长孺抱成案进曰：“钱在是矣。”脱欢察怒曰：“汝胆大如山邪？何所受命而敢无忌者若此？”长孺曰：“民一日不食，当有死者，诚不及以闻，然官书具在，可征也。”脱欢察虽怒，不敢问。

胡长孺思想的果敢、办事的干练，其德、其仁、其智、其勇，于此一事中毕现。《叶治中历官记》作于宋濂、叶琛入明以前。叶琛与宋濂、刘基、章溢同被朱元璋征召，被称为“四先生”，宋濂当然是深深了解叶琛的。但这篇传所记之事止于元至正十八年（1358），并且未言及与叶琛相识，

只是把叶琛作为循吏来传其事的。这是宋濂人物传记中最长的一篇,所记叶琛之事甚多且详,可作者是紧紧地围绕着“其在一郡,则一郡仰其赐;其在一县,则一县仰其福”的原则来决定弃取的。所以虽然所记之事一件紧连一件,件件都详详细细,但因每件都事关民命,愈详细就愈感人,并不琐屑枯燥、味同嚼蜡,却在详细描绘、娓娓叙述之中,把一个以善效官、勤政爱民的循吏形象再现于纸上。

其以德传者,有《李疑传》、《杜环小传》、《记李歌》、《周节妇传》等。这几篇传记多为社会下层的小人物立传,皆侧重于一时一事,如李疑的急人之难、杜环的养人之母、李歌的自卫其贞、赵淑的独保其家。而作家写这些人物时,多采用对比、反衬的手法,突出他们品德的出众。写李疑以金陵风俗为背景;写杜环以谭敬先、常伯章为对比;写李歌则暗以众妓作衬托;写赵淑亦暗以须眉为比照,就在这样强烈的反差中凸现了所写人物的某种美德。这些人物的事迹并不轰轰烈烈,都是生活中普普通通的细事、常事,但能以微见著,以小见大。所以作家在写这些人物时,特别注意细节描写和语言描写,用细节和语言来表现人物的品格。如李疑“亲为煮糜炼药,旦暮执其手问所苦”、“日为刮摩浣涤”洩矢,表现了他待范景淳胜似亲人的善良心地,写得细致而入微。语言描写,不仅符合人物的品格,而且声口毕肖,如杜环的“环虽贫,独不能奉母乎”?李疑的“人孰无缓急,安能以室庐自随哉”?使人物的形象鲜活起来。尤其是《记李歌》,短短的三百四十五字的小文,其关目都为李歌之言,一拒其母:“媼能宽

我，不泽脂、不葷肉则可尔。否则，有死而已！”二骂县令：“吾闻县令为风化首，汝纵不能，而忍坏之耶？今冠裳其形而狗彘其行，乃真贼尔，岂官人耶？汝即来，吾先杀汝而后自杀尔！”三诟贼：“汝欲杀吾夫，即先杀我；我宁死，决不从汝作贼也！”把一个风尘弱小女子的坚贞、刚强、宁死捍卫自己的尊严、捍卫做人的权力，通过语言表现无遗，弱女强项，令人感佩。

其以情传者，则主要写人的情操。如《谢翱传》、《竹溪逸民传》、《白牛生传》、《樗散生传》、《抱瓮子传》、《采苓子传》等等，多写隐逸，所以注重人物的情操和志节。谢翱倜傥有大节，因以布衣知遇于文天祥，被委任咨事参军。文天祥被俘就义，南宋灭亡，谢翱北行至浙江，登严子陵钓台北望吊祭，恸哭泣下，哀痛欲绝，作《登西台恸哭记》，以记吊祭经过，其志节为时人所景仰。宋濂为谢翱立传，从吊祭文天祥起，至与方凤、吴思齐交游止，记载其遨游山水、吟诗作文及著述等，并且评论说：“翱不负天祥，肯负国哉？”以突出其志节。这是描写南宋遗民的隐逸林泉者，所以重在志节。而他写元末隐逸林泉的隐士，多是看透了元代的腐败，或辞官，或不仕，为避乱而隐居，所以多侧重于这些隐者的情操。宋濂写竹溪逸民陈洄如此，写抱瓮子刘彬如此，写采苓子郑濂如此，写他自己（白牛生）亦如此。他们的放情山水，只有共性而无个性，他们的隐，是“渔于山而樵于水”，志不在隐而在于以隐避乱，以隐保持其操守，以隐待机，以隐而得“出处之正”，所以，这类作品注重人物感情的抒发。而抒发的形式，或吟诗，或放歌，或以物比拟，或用事明道，虽缺乏形象的逼真